

星光灿烂

近现代余姚籍名人



余姚市政协文史委编

余姚文史丛书（第一册）

中华书局

余姚文史丛书·第一册

星光灿烂

——近现代余姚籍名人

余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余姚文史丛书 第1册/余姚市政协文史编委会编
—北京:中华书局, 1999

ISBN 7—101—02217—0

I. 余···II. 余···III. 地方史—浙江—余姚
—史料 IV. K2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15889 号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社 址:	100073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印 刷:	浙江新昌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45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1999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主 编 姚业鑫

编 委 邵九华 黄建周
诸焕灿 陈忠来

序

魏新友

数年前，余姚市政协文史委员会酝酿编辑一套有关余姚历史文化方面的丛书，设想把余姚的文化名人、名胜古迹、民情民俗、风物特产、宗教寺庙、戏剧艺术等，具体地记述下来，汇编成一部较为系统的将余姚文化历史进行多层面诠释的书。这应该说是一项较为复杂而困难的工作。好在余姚的历史久远，文化积淀丰厚，有足够的内涵可以编纂一套丛书，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现在这项工作已经付诸实施，《余姚文史丛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我以为出版这套丛书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是余姚文史工作开创性的一项成果。

余姚秦时设县，东汉筑城，至北宋已是“东南最名邑”，明清被誉为“文献名邦”。历代人文荟萃，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姚江学派和黄梨洲开创的浙东史学派，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将中国的思想文化史比作一条波涛滚滚的大河，姚江文化就是这条大河中涌起的一个令人目眩的波峰。无论有多么悠长壮阔的大江长河，总有它各自的源头。思想文化史的发展，也是有源可溯的。余姚的地域面积仅占全国总面积的万分之一点五，但何以它的地域文化在一个时期内能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成为一个高峰，这不能不令世界瞩目，也多少使人有点困惑。及至1973年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现，人们才突

然明白：原来人类文明之河已经在余姚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流淌了七千个春秋，这不但使“东南最名邑”、“文献名邦”有了新的内涵，而且由此改写了中国古老文明的历史，中华文明多元化的论断有了新的例证。河姆渡文化是中华文明主要的一元——长江流域文明的一个源头，余姚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构成。

地域文化，是指在特定的自然区划内人类活动积聚的文明。正是由于绚丽多姿、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汇聚，才形成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河。每一个具有文化历史的地域都有不同于其他地域的文化特征，这是由于每个地域都有它独特的文化人物、文化环境、文化遗迹、文化活动等内涵中的个性和品格决定的。

文化人物是地域文化凸现出来的代表者。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曾经说过：各种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余姚文化成果的显现，就在历代乡贤的身上。余姚自汉以降，就有严子陵、虞翻、虞喜、虞世南、滑伯仁、王阳明、谢迁、朱舜水、黄梨洲、邵晋涵等，在近现代则有许多著名的金融家、实业家、教育家、农学家、法学家、文学家、美术家，他们都是某一个定位上的文化存在，某一种文化人格的代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中国灿烂的文化星空中闪烁着独特光亮的星座。他们是曾经在余姚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千百万人中的优秀代表，应该被人敬重，被人纪念。

余姚地处东南沿海，南列峰峦叠嶂的四明山，中有河网交叉的水乡平原，北濒水天一色的杭州湾，且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动植物资源丰富，这一切为人类早期在这块土地上的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早在七千年前人类就在河姆渡畔开创了光辉灿烂的农业文明。余姚素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有史可查的三国时代的经学家虞翻，就开始招集学生讲学，以

后的历朝历代，读书、讲学、办书院之风盛行，余姚人曾被誉为“两脚书橱”，学识丰富而注重实学，善于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吐故纳新。这样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良好的文明环境，犹如肥沃的土壤、清新的空气、甘冽的水源，使万千大树根深叶茂，高大挺拔，余姚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士、骚人墨客就是这样被孕育和熏陶出来的。

余姚的文化活动十分丰富多彩，单是庙会和武术就在历史上大放异彩。余姚的戏剧是中国戏剧百花园中的奇葩。中国古代四大戏曲声腔之一的余姚腔就诞生在这里。被誉为乡土艺术之花的姚剧曾饮誉京师，驰名两浙，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从明代吕天成、叶宪祖开始，余姚的曲苑剧坛代有人出，在现代涌现出不少有名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余姚的乡音是吴越方言中很有特色的，有人把余姚人称为“余姚啲哉”，就说明余姚话的独特性。而乡音体现的最高点是地方剧种的声腔语调，余姚腔和姚剧在这块土地上独树一帜、独领风骚，就不难理解了。

余姚有“舜耕历山”、“禹藏秘图”的传说，严子陵、王阳明、黄梨洲、朱舜水等彪炳史册的历代名士留下众多的人文景观和动人的传说，姚城现存数十处古代的建筑，散发出历史文化的芳香。文化遗迹是地域文化的重要板块，是历史文化的凝聚点。余姚共有一千多处文化遗迹并能保留至今，是非常能够证明余姚历史文化的厚度的。古老丰富的历史文化，秀丽多姿的山水风光，闻名遐迩的风物特产、古朴淳厚的民情风俗，构筑出余姚古邑的个性特色，凝聚成余姚地域文化的巨大魅力。

历史文化的悠久丰富，是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之一。余姚地域文化的深厚积淀，推动着余姚现代文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我们今天正处在百年世纪交替、千年纪元更迭的时代。余姚作为一个沿海开放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跨入新世纪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现代化中等城市，它的经济的腾飞，亟赖于弘扬文化的优势；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也需要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纂出版的《余姚文史丛书》，是为了能从各个不同侧面展示余姚丰富的地域文化风貌，对于发扬余姚的文化优势该是一种推动；对于让世界了解余姚，让余姚走向世界亦是一个举措；对于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增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精神气质，也会产生一定的激励。《余姚文史丛书》是具有一定史料性和可读性的乡土读物，相信它对余姚地域文化的演绎、嬗变和流向的脉络有所揭示，对余姚地域文化形象的个性化意蕴有所发现，对余姚现在的文化和未来的文化的发展有所启示。愿《余姚文史丛书》能真正体现余姚地域文化固有的品位和魅力。

是为序。

目 录

序.....	魏新友 (1)
一代金融家宋汉章.....	景消波 (1)
企业巨子黄楚九	诸焕灿 (26)
教育活动家蒋梦麟	诸焕灿 (46)
风骨铮铮的学者杨贤江	陈忠来 (67)
锲而不舍 以农为天	
——现代著名农学家沈宗瀚及其家庭.....	吕剑文 (106)
我国现代园艺学奠基人吴耕民.....	周乃复 童银舫 (131)
尚美之途	
——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陈之佛.....	郑炀和 (148)
中国现代病理学创始人谷镜汧.....	谷伯起 (169)
明史专家黄云眉	诸焕灿 (181)
中国犯罪学的开拓者	
——著名社会学家严景耀.....	龚烈沸 (194)
淡淡新月挂疏桐	
——著名诗人邵洵美.....	赵柏田 (223)
多才多艺的大家胡考.....	胡小胡 (256)
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王仲荦.....	龚烈沸 (293)
后记.....	(316)

一代金融家宋汉章

景消波

作为近代著名金融家的宋汉章，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而奔波。从清朝末年到辛亥革命，又经历北伐与抗战，直到全国解放，虽历经时局动荡，风云迭变，宋汉章却始终坚持稳健、谨慎的作风，克己律身，不为流俗所染，专心致力于金融事业，不仅为中国银行的成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又亲自组建、经营了中国保险公司，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孜孜不倦、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值得新一代金融人士继承和发扬。

宋汉章虽然身为金融界知名人士，而且又长期在外创业，却时时不忘家乡的建设，曾多次出资出力造福桑梓，他的一片赤诚的爱乡之心也使我们后人对他多了一份尊敬与怀念。

出生与少年时代

余姚丰南郎霞宋家，一个山清水秀的江南乡村，就是中国近代著名银行家、上海中国银行奠基人宋汉章的故乡。

宋汉章原名鲁，生于1872年4月7日。他的父亲宋世槐，字禹良，号夏善，早年曾在福建办理过盐务，因此全家也

迁居到福建建宁县，宋汉章就出生在那里。兄弟四人中宋汉章排行老二。宋夏善人到中年之时，出于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再次举家迁回余姚，在县城老西门购置房产，取名为“积庆堂”。回乡之后，宋夏善由于受经莲珊^①的邀请，来到上海协助从事电报局的筹建工作，于是，年少的宋汉章也便随父亲来到上海，就读于中西书院。离校后，进入上海电报局工作。在此期间，宋汉章利用工作之余，继续上夜校学习，而且发奋攻读英语，成绩优良，后曾随经莲珊到香港、澳门充当翻译。

在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维新运动中，经莲珊曾出资赞助而且还通电表示拥护，宋汉章也追随其后在电文上签了名。但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慈禧太后再次临朝听政，并大肆捕杀维新派，通电者也遭到清政府的追捕，宋一度随经流亡在外，后经莲珊考虑到宋只不过是签名追随者，并不是清廷追缉的要犯，长期在外流浪不利于他今后的发展，于是就决定让他重返上海，以期能有所作为。这样宋在经莲珊的安排下，再次悄然回到上海，从此将原名鲁改为汉章。

涉足新式银行业

1897年，宋汉章进中国通商银行工作。通商银行是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开设于1896年，它在内部管理方面，采取的是英国银行的一套管理及会计制度，总行的帐册、簿据都用英文记载。在初期，通商银行的业务着重对钱庄的拆放和厂矿的贷款，后又发展了对公私工商业和部分外商的往来，宋汉章进入通商银行后，开始做的是“跑楼”的低级职务。因为当时通商银行聘用英国人美德伦（Mitland）为洋大班，陈笙郊为华经理，“跑楼”的主要工作就是沟通洋大班与华经理之间的关系。正是在通商银行工作期间，宋汉章逐渐掌握并熟悉了外

国银行和旧式钱庄的业务经营和管理制度，并以此为起点，走上了金融事业的开拓发展之路。

1905年，宋汉章去香港处理中国通商银行在那里的一笔呆滞贷款，回来途中邂逅度支部要员陈道遗，两人交谈得十分融洽，从此成为知己。1906年，宋汉章在陈道遗的推荐下，前往北京担任户部银行^②开设的北京储蓄银行经理。1908年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行使中央银行权利。宋汉章则由于工作出色调任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到1911年大清银行在各省省会和通商口岸所设的分支机构已达35处，成为清末规模最大的一家银行，上海则是全国经济金融中心，这些都为宋汉章在金融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作为清政府中央银行的大清银行在辛亥革命爆发后，除上海分行外，绝大多数机构纷纷停业。大清银行原为股份制性质，资本总额达白银1000万两，商官股各占一半。为保全商本，乃于1911年12月成立了商股联合会，时任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宋汉章与商股联合会有密切联系，参与并支持商股联合会的各项活动。经过南北方各股的充分酝酿筹划，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于1912年1月上书孙中山，建议“就原有之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重新组织，作为政府的中央银行”^③，同时还对如何改组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这份报告立即得到了孙中山的批准：“所请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添招商股500万两，以为新政府之中央银行，由部筹款，以雄财力，并请派正副监督，先行开办，克期成立。”^④到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大清银行旧址正式对外营业并举行了成立大会。宋汉章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当时，上海金融市场是由英国汇丰银行为首的外商银行垄断着，中国银行

要想与之分庭抗礼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宋汉章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为扩大中国银行业务，提高中国银行信誉殚精竭虑，终于使中国银行在几经风霜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对于宋汉章个人来说，他通过十几年的奋斗，从一个通商银行的“跑楼”到上海中行的经理，从一个初涉新式银行业的低级职员到享誉沪上的著名金融家，可以说是取得了事业上的巨大成功。然而这种成功决非偶然，而是基于他谨慎好学、锐意进取、奋力开拓的创业精神以及良好有序的管理才能。

小万柳堂事件

当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并继续行使中央银行权力后不久，上海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沪军都督陈其美^⑤逮捕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的事件，即小万柳堂事件。

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就任沪军总督。1911年11月21日，陈其美为适应军事需要发起成立了中华商业储蓄银行，负责经理军需款项。但是由于该行成立不久，不论在人才还是实力上都不能与大清银行相比。而当时沪军都督府日常开支很大，虽然也曾接收了一批清政府的机关和捐税局所，但当事人大都闻风携款潜逃，以致实际的饷银收入很少。财政困难，这对于陈其美来说，确实是面临的一大难题，于是陈其美前往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与宋汉章协商，并要求他定期筹款。但是宋汉章却认为中国银行是官商合股，个人不能擅作主张，对他的要求婉言拒绝。陈其美心中甚是不满，萌生拘押宋汉章之意。

1912年3月24日，宋汉章应华侨梁建臣之邀，去曹家渡小万柳堂康惠卿家出席宴会。小万柳堂地处租界越界筑路范围，后门靠近苏州河，为沪军都督权力所及。陈其美即“侦其出界，派员捕获”，并在事发后宣称：“据王兴汉、陈聚于1

月4日报，宋汉章在辛亥革命前夕，任大清银行沪行经理时，有罔利营私、弗顾大局的行为，因此要派员拘捕，听候审查。”宋汉章被捕的消息传出后，中国银行监督吴鼎昌、中国银行临时理监会和财政总长陈锦涛立即分别于当日电陈孙中山、袁世凯，要求迅速电飭陈其美释放宋汉章。袁世凯鉴于当时形势，于25日致电陈其美：“应按法律由法司正式传谕，未便以兵队诱拿。”并且督促其“迅飭查明释放”。当时任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的伍廷芳也认为陈其美此举侵犯司法权限，有背民主国家法制精神，要陈其美放人，并同陈其美轮番进行笔战。但陈其美并不多加理会，而且继续组织查帐小组查帐，意在寻找宋汉章侵吞公款证据，进而索款，以充军费。陈其美费尽心思，却依然一无所获，找不到宋汉章的任何把柄，在公共舆论的压力下，1912年4月15日，宋汉章终于由钱业董事会保释。保释后的宋汉章立即上书临时政府财政总长熊希龄要求伸雪，并请求辞职，为此熊希龄特作批示：“该员办理前清银行，身名甚好……前晤沪军陈都督，亦谓该员办事谨慎，廉洁私情，并无所亏，今幸公家彻底清查，水落石出，正以表见该员之无私弊，此后益昭信用，切不可因此灰心也。”^⑥至此，一场拘捕中国银行经理的案件遂告结束，陈其美试图采取勒索做法，拘押宋汉章，进而筹集军费的目的没能实现，而对宋汉章来说，他虽然被关押了20多天，终因他公私分明，廉洁奉公，不但保持了身名的清白，反而进一步获得了社会的称誉。

抗拒停兑令

如果说从宋汉章与陈其美的交纠事件中，体现出宋汉章公私分明、廉洁自律的工作作风，那么此后发生的上海中国银行

在宋汉章的领导下，抗拒北洋政府停兑令的事件，则展现了宋汉章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得失，胆识俱优的金融家风范。

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实际上开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时期。北洋政府自组成之日起，财政收入就十分拮据，1912年9月到12月，入不敷出的差额达4290万元，到年底共欠内外债高达1.7亿元，其中还不包括庚子赔款。权欲和野心极大的袁世凯又热衷于当皇帝，为此他穷兵黩武，耗尽国库。在财政面临破产的危机下，袁世凯与当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策划，准备合并中国、交通两银行，集中两行在各地各行里的所有库存现金，挪作私用。于是在1916年5月12日发布了停兑令，即强迫中国、交通两银行兑换券停止兑现和存款停止兑现。这使各地金融市场混乱异常，中国银行信用大减，元气大伤，而且由此引起的京钞问题又困扰中行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只有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以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璈的主持下，毅然抗拒乱命，才使停兑令的严重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1916年5月8日，中、交两行总行就密令上海两分行迁往租界外南市十六铺营业，对此两分行都询问过迁移的原因，但没有得到答复。5月11日，段祺瑞内阁召开紧急国务会议，决定两行从12日起停止兑现、付现。12日清晨，国务院的停兑令到达上海，要求“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并严令“如有官商军民人等不收该两行货币，应随时严行究办，地方官务酌拨军警监视该两行，不准私自违令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⑦。令下后，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立即处于不安与惊慌之中，市面一片混乱。对此，上海中国、交通两行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上海交行遵令停兑，上海中行则不然。早在停兑令下达之前，由于种种迹象表明政府限制两行付兑将

有重大措施，以宋汉章为主的银行负责人就事先组织股东成立了股东联合会进行秘密磋商，收到停兑令后，股东联合会就立即召开会议，作了五项决议，其主要内容：一是公举监察员 2 人，到行管理全行事务；二是请律师 2 人，代表股东接收全行财产；三是所有发行准备金移交律师处理；四是登报通告中行仍然照章办理，所有分行钞票一律照常兑现；五是到期存款一律照付现金。作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宋汉章与副经理张嘉璈经过详细计议，认为如果遵令停兑，不仅影响上海中行的声誉，更直接地影响到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银行决不能停兑，于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于 13 日毅然宣告拒绝接受政府命令，坚持照常兑现、付现。

上海中行率先抗拒停兑，作为负责人的宋汉章面临很多难题。首先，当时全国中行发行兑换券 4000 多万元，但准备金只有现银 350 万两，银币 488 万元，其中约有半数属上海中行。如要应付挤兑、挤提，则还差 40% 左右。为预防现款不足，宋汉章亲自往返汇丰、德丰两家银行，准备以分行行址和苏州河岸堆栈以及收押之地产道契作为担保商借透支，以防不测；其二更使宋汉章顾虑的是，北洋政府要以违抗命令为由，将其免职并勒令离行，这样的话他就没有时间与机会去执行所预定的计划。为此，宋汉章又前往访问上海会审公堂法官，征询有何办法可以使现任经理有数日时间可留行继续工作。法官认为：如果中行利益关系人，如股东、存户、持券人等，向公堂控诉经理有损害彼等利益的行为，要求法庭加以阻止，即可成立诉讼，在诉讼未判决期间，北京当局不能逮捕现任经理。于是，宋汉章与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常务董事长蒋柳卮、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人协商决定，由李、蒋、陈三人分别代表中国银行股东、存户及持券人，各请律师向法庭起诉，以确保宋汉章在这

几日里有执行抗拒停兑令计划的可能。除了上述两点外，宋汉章还考虑到袁世凯政府势必要摧残他们的反停兑行动，因此不得不借助股东为后盾进行抵制，从而成立股东联合会，以张季直为会长、叶揆初为副会长、钱新之为秘书长，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

宋汉章在采取克服了上述困难的对策后，还以股东联合会的名义通电国务院、财政部、各省行政长官及各地中行分行，阐明此次抗命的原因：“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现，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收入信用一去不复。沪上中国银行，由股东会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千望合力支持，飭令中国银行遵办，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下一线生机。”^⑧此文发表后，军政商会方面对中行抗令表示了支持，首先复电赞成的江苏都督冯国璋、省长刘耀琳，认为事关国脉存亡，自当竭力维持。租界巡捕房也派中西探捕到行照料，因此避免了骚乱的发生。在13日到19日挤兑数日期间，上海中行共兑出160余万元，存款提取达百万元。在抗拒停兑令消息传开以后，人心稍定，风潮渐趋缓和，在各方大力支持下，上海中行度过了挤兑难关，取得胜利。6月1日，袁世凯政府为挽回人心，发表了一个措辞含糊的通告，停兑事件终告段落。

政府的一纸院令，使上海金融业及其他行业所受的损失真是不可胜计。上海中行挺身而出抗拒停兑，并取得胜利，使中行兑换券的信用大为提高，影响所及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中行在当地所发行的钞票受到了十足的信任。实际上，中行抗拒之举的影响还远不止此，风潮过后，中行在国际上提高了地位，遇到上海市面发生金融风潮时，往往由汇丰、麦加利银行会同中行来维持市面。